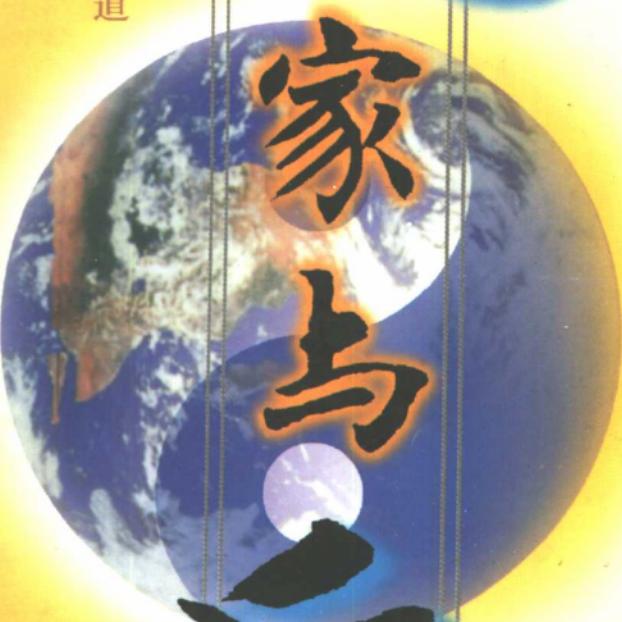


道家与兵家



家

与

兵

家

西苑

山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无”，
名天地之始；
“有”，
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
欲以观其妙；
常“有”，
欲以观其微。
此两者，
同出而异名。
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姜国柱 著

故善战者，
求之于势，
不责于人。
故能择人而任势。
任势者，
其战人也，
如转木石。
木石之性，
安则静、
危则动，
方则止，
圆则行。
故善战人之势，
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
势也。

道家与兵家

姜国柱 著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家与兵家/姜国柱著. —北京:西苑出版社,1997

ISBN 7-80108-094-7

I. 道… II. 姜… III. 道家-兵法-中国-古代 IV. E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460 号

西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 7 号 邮政编码 100039)

河北省徐水新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2 月第一版 1998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875

字数:287 千字 印数:1—3000 册

定价:17.00 元

前　言

中国是世界的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华夏民族虽然历经磨难，屡遭变乱，然而最终均能由乱达治，使民族命脉繁衍不断，生生不息，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思想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了绝无仅有历史贡献。这些优秀而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既是中华民族高超智慧的结晶，又是人类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中国思想文明与人类文明发展一样，是一个连续发展、前后相承的连续体，它有艰苦探索、诸家纷呈的昨天，才有辉煌发展、不断创新的今天，更有日新月异、朝气蓬勃的明天。

中国思想文化是诸家蜂起、多元并行的发展，因而使其呈现出思想纷繁、内容丰富、内涵深刻、体系完整的思想局面。在这个丰富多彩、纷繁复杂、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史中，是以儒家为主干，以道家和儒家为两大派，以诸家为侧翼而展开和演变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汉代经学的出现和黄老之学的勃兴，魏晋玄学的滥觞和道家思想的深化，唐代儒学的复兴和老学的发展，宋明理学的创立而使儒、道、释三家思想在更高层次达到了融合，这种融合是以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思想为基础，吸取外来的佛教思想，而使中外思想相结合，并使外来思想中国化，中国近代乃至现代儒、道两家仍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起着重要作用，并向世人展现出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重要的思想价值。正因为儒、道两家思想科学、合理，并适应于社会各个方面实际需要，所以能在几千年的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中，绵延不断，经久不衰，至今仍为世人所推重。

在中国历史悠久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各家之间既互争雄长、彼此

攻讦，又互相吸取、彼此融合，从而并肩前进，共同发展。在这种对立统一的共同发展中，道家和兵家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道家和兵家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两家，它们在中国历代的思想发展中，是相互影响、彼此吸取、同步发展的。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精心研究、认真分析、缜密思索道家与兵家的著作、文献后，就会发现其思想，虽有不少相异、相歧、不同之处，但其军事思想却有许多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尤其是道家与兵家的用兵之道、运兵之策，即军事谋略思想、战争指挥艺术等，十分相似，彼此去取，相得益彰。正是道家与兵家的智慧所献，而使中国乃至东方军事谋略学极为发达，充满睿智，它为历代兵家所称颂、运用，也为今人所推崇、应用。

兵家言兵，题中之义，自不待言；道家论兵，不乏其人，原因何在？如果我们全面考察、深入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史时，就会发现人类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与自然奋斗、与人群奋斗、与社会奋斗，在这些奋斗之中，要想取得胜利，繁衍下去，就必须有智慧、有勇力、善养己、善卫己，因此，就非常重视“智”、“勇”、“养”、“卫”之事。随着人类社会的前进发展和对这些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便产生了两个久远而普遍的现象——哲学与兵学。这是同一棵人类认识之树上所结出的两个硕大智慧之果。它们是人类思想文明发展史上古老而普遍的社会文化理论。虽经历史变迁，人事沧桑，但它们却依然存在，永不式微，并伴随历史发展、社会前进，而日益丰富、日臻完善，至今更加光彩夺目。

兵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主要是研究军事理论、用兵谋略、战争策略的学术派别，他们论兵、言兵，实属必然、理为当然。道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主要是探求宇宙之奥、人类生存之道、人君治国之术。由于道家重人生、讲治国，而对人的生养、国的防卫之事，十分重视，所以他们也常常论兵、言兵。因此，道家与兵家在这里找到了结合部，产生了理论的生长点，这便是他们思想的相同、相近、相即之根源所在。

本书之所以取名为《道家与兵家》，就因为在本书作者看来，在中

国历代军事理论、战争谋略、战术指挥等理论学说的构建中，道家贡献了宝贵的智谋，并深深地影响着兵家，从兵学理论角度看，道家与兵家有许多相同处、相通处、相合处、相近处、相即处，所以本书以此命名。本书在分析论述中的着力点是道家的军事思想和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兵家的军事思想，即从比较、联系的角度去分析论述道家与兵家军事思想的异同，而不是论及所有的兵家的军事理论，也就是说只选择与道家有关系的兵家予以分析论述，至于道家学者的军事思想，理所当然地在论述之列了。于中想厘清道家与兵家的军事思想及其历史贡献、理论价值。

依我之浅见，在先贤和时贤的研究著作中，论道家者则着重“道”的本体论、形而上意义和养生之道、治国之术等方面分析论述，而很少注意论及其军事谋略、用兵之道、作战艺术；论兵家者则着重军事理论、兵书战策、军事技术等方面分析论述，而应当说这种分析研究是必要的、有价值的。但是，应当承认对道家的军事理论、智慧谋略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道家与兵家关系问题的研究，则显得不够，研究成果较为鲜见。

本人经过多年的查阅文献，反复思索，分析研究，从道家与兵家的有关历史资料中窥见其军事思想、军事谋略的密切关系，人们尊奉孙子（孙武）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孙子》被推尊为“兵学圣典”，“世界第一兵书”等等，这是有根据、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进一步深思和追索，就会发现孙子之所以能总结并写出《孙子》这部伟大兵学著作，除了与其所处的春秋时代诸侯争霸、战争不断的社会经济、政治及其本人卓绝才能有关外，还应当承认与老子军事思想有密切关系。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承认：老子的“柔弱胜刚强”，“不以兵强天下”、“以奇用兵”、“不战而胜”、“哀兵必胜”、“胜而不美”等军事谋略思想和战争观点，不仅对孙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中国乃至东方历代的军事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他们所继承、吸取、发挥、运用，从而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思想、思维方式相一致、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军事谋略学和军事思想理论体系。于中可见道家与兵家思想的

紧密联系。

我们知道，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文献典籍中，在中国乃至世界影响最大的几部著作中，《周易》、《老子》、《孙子》则是其中之一者，它们都是以哲理论兵略，论兵略寓哲理，于哲书见兵情，于兵书见哲理。因此，有人把哲学名著《老子》视为“兵书”，应为“言兵者师之”，把“兵学圣典”的《孙子》视为“心照宇宙”的哲学著作，把《周易》视为“言易”亦“言兵”之书。关于这个问题，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的看法，则有其综合性、全面性、合理性、代表性。他在《孙子集注序》中说道：“《易》其言兵之书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所以动而有悔也，吾于斯见兵之情。’《老子》其言兵之书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吾于斯见兵之形。《孙武》其言道之书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吾于斯见兵之精。故夫经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孙》也，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也。”魏源在这里指明了道家与兵家思想的相通、相合之处，这是非常精辟的智者之见。

本书在正文中将按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对道家与兵家的军事谋略思想及其密切关系作具体的分析论述。本人所学的专业是中国哲学史，主要研究方向是宋明理学，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常常离开根据地、主战场，步入了中国军事思想史的领域，曾发表了几篇古代思想家、军事家论兵的文章，诸如老子、晏婴、王符、曹操、唐甄等人的军事思想的文章。陈鼓应教授得知这一情况后，积极主张我撰写一部《道家与兵家》，以填补这个研究空白，我自知才疏学浅，学术研究起步又晚，对道家知之甚少，对兵家不甚了了，要分析论述“道家与兵家”之军事谋略思想，实为难上之难，力不从心。但由于陈鼓应教授的精诚所至和出于我们的友谊，我便开始对这个重要而复杂的课题进行了潜心研究，不断探求。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苦心思索，最终写成下面这个样子。其好坏成败，是非得失，自己不敢断定，让广大读者、专家去评判、论定，我只想抛此砖而引出美玉。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国兵学缘起	1
第一节 原始战争的起源	1
第二节 战争为人之大事	2
第三节 诸子百家皆察兵	5
第二章 老子的用兵之略	8
第一节 老子及《老子》简辨	8
第二节 “不以兵强天下”	9
第三节 “以弱胜强”	12
第四节 “以奇用兵”	15
第五节 “胜而不美”	19
第三章 先秦道家的军事谋略思想	22
第一节 范蠡的用兵之略	22
第二节 《黄帝四经》的兵略	29
第三节 文子的军事谋略思想	38
第四节 鸦冠子的军事思想	51
第四章 孙武的军事谋略思想	59
第一节 生平和著作	59
第二节 严整的军事思想体系	61
第三节 整体思维的战争论	63
第四节 唯物主义的战争观	66
第五节 对立统一的方法论	69

第六节	知彼知已的认识论	74
第七节	《孙子》的思想影响	78
第五章	先秦兵家的军事谋略思想	80
第一节	田穰苴的谋略思想	80
第二节	吴起的谋胜思想	87
第三节	孙膑的智胜思想	94
第四节	尉缭的军事思想	104
第五节	《六韬》的韬略思想	114
第六章	先秦法家的军事谋略思想	132
第一节	《管子》的谋兵思想	132
第二节	商鞅的军事思想	148
第三节	韩非的军事思想	156
第七章	秦汉道家的军事谋略思想	172
第一节	《吕氏春秋》的谋胜思想	173
第二节	《淮南子》的用兵之略	193
第三节	《阴符经》的用兵之略	209
第八章	汉代兵家的军事谋略思想	216
第一节	《三略》的用兵之略	216
第二节	王符的军事思想	224
第三节	曹操的谋胜思想	235
第四节	诸葛亮的智胜思想	241
第九章	唐代道家的军事谋略思想	264
第一节	李筌的军事思想	264
第二节	王真的谋略思想	284
第十章	唐代兵家的军事谋略思想	304
第一节	李靖的军事谋略思想	304
第二节	赵蕤的军事谋略思想	313
第十一章	道家兵略的发展趋向	324
后记		337

第一章 中国兵学缘起

道家与兵家是中国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中较早出现的最重要的两家。道家为老子所创立，兵家为孙子所创立，他们都为春秋末期同时并世而诞生的两个伟大人物，确切地说，老子稍前，孙子稍后，故老子思想影响了孙子，孙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军事思想。

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出现，不只是天才人物的偶然灵感发现，也不是神灵的主宰恩赐，而是社会历史实践长期发展的结果，就是说，每一个伟大人物及其思想的出现，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都是时代的产物。

为了说明道家与兵家的军事思想的出现和形成，我们有必要简单考察一下战争的起源、发展等问题，进而论述他们为什么都重军事、讲谋略、通战术的问题。

第一节 原始战争的起源

人类在其发轫之初，为了求得生存，繁衍后代，就必须非常重视“生养”和“防卫”之事。为了生养就要劳动，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为了防卫就要采用必要的工具、手段，这两者都需要智慧、勇力。在初民时期，生养和防卫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如打猎的求生工具与防卫的作战武器，是同一个东西。生养为人之大事，防卫亦同样如此。因此，战争在原始人那里就已经发生了，并且屡屡发生、连续不断、延至今天。在人类漫长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究竟打了多少年的仗、发生了多少次的战争？据瑞典、挪威、英国、印度等国学者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的5164年中，世界上共发生14513次战争，

其中只有 329 年是和平的。又据原苏联学者统计，从公元前 1496 年到公元 1861 年这 3357 年间，人类有 3130 年在打仗，只有 227 年是和平的。由此可见，战争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频繁众多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中而不断地前进着、演变着，战争亦随着人类社会的前进、武器装备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形态。所以说，战争是与人类共生的暴力现象，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发生着、存在着，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记载原始战争的发生、起源，可谓史不绝书。如此说来，不能不作分析地断定有阶级才有战争，原始社会没有战争。在我看来，不在于否定、排斥原始社会存在战争，而在于如何分析、认识原始战争。

第二节 战争为人之大事

战争与人的生存、生活、生命紧密相联，而成为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中国古人称“兵”为国之大事，正是此义。兵为国之大事，兵的主要的基本的职能是进行战争，夺取胜利，保卫人民，卫护社稷。因此，战争在古人的观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充分肯定战争的重要地位、作用。他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斗争的产物，而战争与斗争是相同的概念，因此他极为推崇战争。他说：“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的必然性而产生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19 页）又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同上，第 23 页）战争是普遍的、万能的，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一切事物都是从战争中产生的，所以战争是伟大而神圣的。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

在中国的先贤圣哲中，把兵（战争）视为大事，尤为普遍。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有关兵戎、战争在人们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的论述，更是屡见不鲜的。中国的先民在蒙昧时期，为了采集食物和狩猎

动物，常常发生手持石块、木棒的武装暴力冲突，这大概就是古人所朦胧追忆的“兽处群居，以力相争。”《管子·君臣》“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荀子·富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韩非子·五蠹》“未有蚩尤之时，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吕氏春秋·孟秋纪》“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有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除秽，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兵之所由来者远矣。”《淮南子·兵略训》战争在人们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历史非常久远。据考古学发现，远在北京人时期，就已经发生了武装冲突。从考古中所发现的北京人的头骨化石材料可见，其完整无伤者甚少，多数为打击伤痕。据此，考古学家断定：这些带伤痕骨化石是被吃掉的战俘遗骨，从而“可以肯定远古的北京人有食人之风。”（《远古食人之风》，《化石》1979年第一期），这就说明，远古时代以食人为目的的武装冲突，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到了神农时期，有了原始农业，由于人口增加，食物来源减少，神农虽教民稼穡，但食物仍不足，故战争不断发生。“昔者，神农伐补遂。”《战国策·秦策》“夙沙氏，自攻其君而归神农。”《吕氏春秋·用民》“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史记·五帝本纪》说明战争之频繁而重要。由于氏族部落集团的增多，需要大片的森林、广阔的土地进行狩猎采集和游牧农业，使部落集团的接触日益增多，彼此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因而使战争连绵不断。据史书记载和历史传说，我国古代著名的大战有：一是神农与斧遂之战；二是共工与蚩尤之战；三是黄帝与蚩尤之战；四是黄帝与炎帝之战。黄帝经过“三战”“然后得其志。”（同上）形成了以黄帝族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又经过“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从而决定了华夏民族的命运。战争给中华民族的文明社会刻上了深深的印记，并对形成中国国家特点起了重要的作用。

战争的经常化、突出化，使战争的指挥者和参加者的地位不断提高，作用不断加强，战争中的军事首领，则为后来的政治领袖准备了人才。恩格斯说：“在有些部落中间，有一个最高的首领，但是他的权力并不大。他是酋长之一，当需要紧急行动时，他应当在议事会召集会议作出最后决定之前采取临时的措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具有执行权力的官员的微弱萌芽，不过它在进一步发展方面多半都没有结果；这种官员，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虽不是到处，但是在多数场合，都是由最高军事首长发展起来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89页）恩格斯的论断完全符合中国古代的历史事实。从中国最早的军事首领之一的诸侯的来源看，这种官员是属于那种有结果的一类。杨树达说：

盖草昧之世，禽兽逼人，又他族之人来相侵犯，其时以弓矢为武器，一群之中如有强力善射之士能保卫其群者，则众必欣戴以为雄长。古人质朴，能其事者即以其事或物名之，其人能发矢中侯故谓之侯也。《礼记·射义》曰：“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之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侯。”郑康成注《周礼·司裘》曰：“所射正谓之侯者，天子中之则能服诸侯，诸侯以下中之则得为诸侯。此后世演变之说，非复初义”，然诸侯之义源于射侯，则犹存古初命之形影也。（《积微居金文说》卷一《矢令癸三跋》）

于此可见，中国古代国家的政治官员，最初起源于战争中的军事首领，后来沿用了军事首领的称号。说明战争在社会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战争使一些部落形成联盟，促进了民族的形成。在部落战争中，一些部落为了战胜对方，或防止对方的反攻，而建立了较大的部落联盟。中国远古就有这种部落联盟，如炎帝族的共工与蚩尤之战时，就求助于黄帝；炎帝与黄帝虽交战过，但最终结成了炎黄联盟，形成了华夏民族。战争对民族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郭沫若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氏族部落内部财产的差别和因阶级分化而

出现的氏族显贵，形成了各个部落间的共同利益，也形成了各个部落间的矛盾与冲突。于是近亲部落因为对内和对外的关系而团结起来，结成了巩固的部落联盟。……这些部落之间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联合，最后出现了以尧、舜、禹为首脑的强大的部落联盟。”（《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67—68 页）华夏民族就是在战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种种史实都说明战争在原始人和文明时代人的生活中，都占据重要而突出的地位。郭沫若说：“战争在原始人的生活上是很重要的，这是谁也可以想象得到。《易经》中战争的文字之多，实在任何的事项之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40 页）接着他援引《易经》中的二十六条有关战争的内容说明其重要性。

大量事实证明，古人确实把“兵”（战争）视为大事。人群的生存、繁衍依赖于战争；部落、民族的形成依赖于战争；国家之所以产生、成立依赖于战争。国家产生之后，战争的地位尤为突出。从殷代出现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卜祭祀占首位，卜征战是最重要的一项。甲骨文中的“国”作“或”，即以武力保卫人口之意。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古者先振兵释旅、然后封禅。”（《汉书·郊祀志》）祭祀天地与征服自然求得丰收的“生养”紧密相关；进行战争与征服他族求得生存的“武卫”紧密相联，所以“祀与戎”为“国之大事”，对于这样的“大事”，当然要求神问卜了。“祀与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相依赖，缺一不可的。

第三节 诸子百家皆察兵

战争既然在人的生活中占据突出的重要地位，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当然为人们所重视了，中国远古时代人们就重视战争，历史到了春秋时代，人们已把“祀与戎”看成是“国之大事”，这说明了人们对战争的意义、作用的认识前进了一步，升华到新的高度。随着历史的发展，战争的扩大，认识的深化，在春秋末年，社会形态的急剧转变的社

会实践中，道家创始人老子在其伟大的哲学著作《老子》中，在阐发其深奥的哲学义理的同时，阐发了一系列的军事谋略、用兵之道、指挥艺术。老子反对战争，尤其是厌恶穷兵黩武的“不义”战争，把“兵”视为“不祥之器”，“凶险之器”，但“不得已而为之”时，则要讲究谋略，注意策略，从而克敌制胜，赢得战争。因此，老子又非常重视战略、策略，老子不仅言兵、察兵，而且深知兵、善用兵，难怪历史上有人常常把《老子》视为“兵书”，列入“兵家类”，并推尊为“言兵者之祖”，“言兵者之书”，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老子提出的一系列谋略思想，军事原则，为历代兵家所重视、推崇、奉行。可以说老子开了中国系统军事谋略思想的先河，在这一点上真可以谓“老子天下第一了”。

春秋末年，继老子之后，伟大的军事家孙武，吸取了其先行者老子等人的军事思想，总结了以前和当代的战争经验，而写成《孙子》这部“世界古代第一兵书”，而为“百世兵家之师”。在《孙子》这部光辉的兵学著作中，孙子开宗明义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始计》）孙子深刻地认识到，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人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所以要慎重地考虑，认真地对待。孙子正是在慎察、详察、密察、深察的基础上，吸取了老子的军事谋略思想，提出了一整套的军事谋略、战争艺术、指挥技巧等战略策略思想。孙子的军事思想，是对以前的军事思想和当代战争实践的科学总结，它对后世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被许多军事家所继承、应用。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剧变，战争的频繁，诸家的蜂起，而使诸子百家都对“兵”这个“国之大事”非常重视。就我国先秦时期诸子百家而论，各家都在察兵、言兵，“兵家”言兵自不待说；“道家”言兵前已略述；“儒家”孔子、孟子、荀子言兵，深有宏论，荀子还有《议兵》等兵学著作；“墨家”的创始人墨子力主“兼爱”、“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其《城守各篇》“皆兵家言”；“法家”商鞅、韩非，更是重兵、言兵，《商君书》的《战法》、《立本》、《兵守》等篇，直是兵学著作，商鞅被人称为“善用兵者”，韩非兼采儒、道、墨三家学说，把法、术、势融为一体。

体，甚重视兵学、刻意言兵；“名家”邓析、尹文也尝言兵，邓析的“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闲习，不可以当敌；庙算千里，帷幄之奇；百战百胜，黄帝之师”，尹文的“兵甲劲利，封疆修理，强国也”，“禁暴息兵，救世之斗，此人君之德，可以为主矣”，并且十分推崇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的策略，可谓言兵、知兵；“阴阳家”以阴阳变化之理来“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进而以此解释宇宙万物是阴阳两种对立矛盾互相盈缩、消长的结果，此论为兵家所吸取和应用，形成“兵阴阳家”，于斯可见“阴阳家”言兵之理；“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兼采各家、兼言各家，兵家思想自在其中，而《荡兵》（一作《用兵》）、《振乱》、《禁塞》、《怀宠》等篇则是兵学著作。于此说来，先秦诸子百家都在言兵、论兵、察兵，而且知兵、谋兵、用兵。

如果我们全面阅读、仔细查找、精心研究，则会发现，在先秦的典籍中，不仅子书中言兵、论兵、察兵、知兵、谋兵，而且在经史诸书中，亦大量言兵、论兵、察兵、知兵、谋兵，《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战国策》等等，无一不言兵、察兵。

秦代以降，言兵者日益增多，兵学著作日益丰富，经、史、子、集言兵，政书、方志、类书、笔记杂著、诗词歌赋等，亦言兵，真可谓兵书即群书了。

我们知道，“兵”在古人的观念中是指兵家、兵器、军事、战争之义。“兵书”是指记载、论述、研究军事的著作。由于诸家言兵、诸书言兵，所以先贤们常常把“兵书”归入“诸子类”，而不归入“兵家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虽把兵家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四种，但兵书与他类书交叉、重合者甚多，于中可窥“兵书”即“群书”之理了。

在诸家言兵、论兵、察兵、知兵、谋兵之中，我们认为，除兵家之外，首推道家，而老子实为兵学开山祖，孙子则使老子兵学思想系统化、完整化，而成为兵家鼻祖。

第二章 老子的用兵之略

第一节 老子及《老子》简辨

老子其人其书，自古以来，由于不同记载、不同见解，而众说纷纭，歧义很大，至今仍莫衷一是。

本书作者认为，老子即春秋末期楚人老聃，曾做过周朝的史官，掌管着周朝的典籍。他生当周王朝衰败之时，目睹奴隶逃亡、起义，王朝内部相互倾轧、残杀，各诸侯国的纷争、征战的现实，而抱着“超然”、“无为”的态度，晚年过着独善其身的隐居生活。老子的生卒年月，虽不可详考，但年长于孔子，孔子三十四岁时向老子请教过周礼的问题，当为史实。老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80年（周简王六年）至公元前500年（周敬王二十年）左右。孔子则生于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故老子在孔子之前。

关于《老子》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老子》一书当为老聃所作，由其后学补充、修订而成，成书年代不至晚于战国初期。因为在与老子生活年代较近的先秦典籍中，诸如：《战国策》、《庄子》、《荀子》、《韩非子》、《尹文子》、《吕氏春秋》和《礼记》等，都援引《老子》之言，记述老聃之事，说明各家都明确地看到《老子》。这些史料证明，先秦时代对于老聃著《老子》之事，是肯定无疑的。至于具体考证与论证，在此不予赘述。

关于《老子》为“兵书”问题。《老子》是我国先秦时期道家的一部